

民主化的理论系谱： 从现代化理论到结构化理论

■ 甘 锋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 上海 200030)

【摘要】本文简要的梳理了过去几十年学界对民主化现象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对主要的民主化理论进行了评价。民主化的理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宏观探索、微观导向和理论融合,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结构理论、文化理论和过程理论等丰富的民主化理论。其中,现代化理论、结构理论与文化理论又被统称为民主化的宏观理论,主要认为民主政治的出现和发展是由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或文化价值决定的;而过程理论被称为民主化的微观理论,主要认为政治行为者的选择和博弈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建立民主政治体系。这些理论在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进化色彩,后一种理论的发展是针对前一种理论存在的缺陷而进行的。总的说来,从宏观理论、微观理论到理论融合不仅代表着民主化理论的研究成就和发展趋势,而且对于那些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民主化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主化;现代化;结构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2]05-0155-06

民主化理论是对民主化现象的理解和解释。“民主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不民主走向民主的过程。它涉及到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和保障,改变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的性质、制度性权威的运作方式,有利于制度发展和制度建设的社会环境,这一过程还涉及到锻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市场化的经济制度、为民主的理想和制度提供社会依托的市民社会。”^①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勒纳、利普塞特等西方政治学者已经开始探索实现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席卷全球后,更多的政治学者投入到了对民主化的研究之中。到本世纪初,第三波民主化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学者们对民主化的探索却依然孜孜不倦、兴趣盎然。西方学者对民主化近半个世纪坚持不懈的研究先后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结构理论、文化理论、过程理论等丰富的民主化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并剖析其不足,在民主已经成为普适性价值的今天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民主化的国家而言。

一、民主化的宏观理论

(一)现代化理论

1. 理论的基本要义

民主化的现代化理论主要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大规模的跨国统计分析和量化分析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结论是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正相关性,民主和民主化更可能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

2. 理论的发展脉络

第一,马丁·利普塞特是民主化的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他在《政治人》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其发生民主化的可能性越大;而一个国家越贫穷,越不可能民主。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对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对各个国家相关数据的统计比较分析,他发现欧洲稳定的民主国家在经济发展五个

作者简介:甘锋(1973-),男(汉),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①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

指标方面的得分比拉美的独裁国家都要高,而拉美不稳定的独裁国家在经济发展各个指标上的得分上又比拉美稳定的独裁国家高。利普塞特据此推断,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其越可能民主。^①第二,科曲特在1963年以不同的指标对7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社会和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②第三,巴罗对100个国家统计分析的结果支持利普塞特的假设:经济繁荣产生民主。^③第四,戴尔蒙德和加利·马克通过对几十个国家的量化统计分析也指出,利普塞特的核心假设已经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检验,“一个国家的人民平均越富裕,他们越能够为他们的国家赞成、取得和维持一个民主系统”。^④还有许多学者以同样的方法不厌其烦地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验证,大部分的研究结论支持利普塞特假设,其中一些研究还发现了政治文化、种族分裂、社会冲突、政党体系等变量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3. 理论的进步与不足

民主化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加深了人们对民主化经济前提的理解;但是无论就其所得出的结论还是其方法,都受到了诸多的诟病和诘难。

首先,社会现实给出了最有力的反驳与批判。历史事实证明,民主并不只是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民主。土耳其在二战之后就建立了民主体制,但当时它还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城市化水平和识字率都很低,经济发展远远低于民主化应该发生的水平。印度在1947年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最不发达的国家,它的大部分国民是文盲,并且处于饥饿状态。但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它建立并长期保持了完善的民主体制。相反,按照现代化理论推论,二十世纪20年代之后的德国作为世界上最现代、最发达的社会,本该拥有先进稳定的民主政治。可是其脆弱的民主很快崩溃,转向了极权主义体制。今天的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但政治上仍然保持着半威权体制,没有表现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正相关性。

第二,理论的弊端。就其研究方法而言,能否获得各个国家相关方面的详细资料和准确数据(特别是那些后发展国家的早期资料和数据)以满足统计定量分析的科学化要求,经常受到质疑。现代化理论忽视了对社会群体或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的研究,而这些变量是架起宏观的社会经济变化与宏观的政治变化之间桥梁,因此使得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因果机制一直处在黑箱之中。奥唐奈总结了现代化理论的六大弊病:第一,现代化理论基本假设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检测。第二,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只能在最富裕的国家得到证实。第三,现代化理论对那些与它们的研究结论不符的国家置之不理。第四,现代化理论把对部分国家研究得出的

社会经济与政治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看作是普遍性的结论,有待商榷。第五,现代化理论用一系列国家在某一时刻点上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这些国家在一个时期的政治变迁,同样值得商榷。第六,经济发展在大多数时候仅仅导致了“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zation),而不是民主,但是现代化理论往往把政治多元主义等同于民主。^⑤

尽管现代化理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弊端,但它依然是民主化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理论。这固然是由于它对民主到来的承诺迎合了人们的期望,但亦不能排除其本身的科学价值。

(二) 结构理论

1. 理论的基本要义

民主化的结构理论关注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的变迁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它假设长期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对于当下政治体制的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主政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社会结构如何变迁或者一个特定阶级的力量增长状况,而不是政治精英的创造和选择。因此,它主要通过对所选取国家的长期历史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从经验事实中发现何种社会结构模式或那个阶级有利于民主化的发生。

2. 理论的发展脉络

第一,巴林顿·摩尔被看作是结构主义理论的先驱。他在1966年出版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是民主化结构理论的经典之作。莫尔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是,自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中期,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为什么英国、美国和法国在政治体制上转向了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日本和德国转向了法西斯,而中国和俄国则转向了共产主义。莫尔通过对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印度、中国六个主要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发现原因在于各个国家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长期社会结构演变的影响。具体而言,导致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条件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十分虚弱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通过政治手段对农民实施剥夺,而农民因为乡村社会的连接容易采取集体行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社会结构条件是,国家与强大的地主阶级实施联合,资产阶级弱小而且依赖于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农民被地主阶级以人身依附的方式实施控制,国家发动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产生自由主义议会民主的社会结构条件则包括,地主阶级相对虚弱,没有控制国家权力;资产阶级十分强大,促使地主阶级和农民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并渴望改变国家权力结构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成为市场上的自由人。^⑥莫尔以社会结构为核心的结构理论对民主化做出了阐释——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第二,继莫尔之后,罗斯切梅尔等人用比较历史的方法对社会结构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研究。罗斯切梅尔指

①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5-27.

②Cutright.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measure and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April), P67.

③Robert J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MIT Press, 1985, P138.

④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9-128.

⑤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9, p4-7.

⑥巴林顿·莫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 华夏出版社, 1987: 334-368.

出,社会结构由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包括农村中的雇工和农民)、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通过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美国家及其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社会历史发展中各个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比较历史研究,罗斯切梅尔发现这些阶级从它们的自身利益出发,对民主化采取或者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地主阶级在历史上是民主化的最大反对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地主阶级的利益依赖于对大量廉价劳动力(农民)的剥夺,但是民主化改变了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并提高了农民的劳动力价值,从而严重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民主化只有在地主阶级力量虚弱的国家才可能发生。农民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愿意推动民主化的发生,不过他们很少独自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资产阶级经常被看作是民主化的主要支持力量,但是历史事实表明,他们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十分暧昧;虽然他们不像地主阶级那样明确的反对民主,但是也很少积极的支持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产阶级也往往被看作是发展民主的重要力量,然而他们的作用同样十分模糊;由于内部的异质性和在阶级结构中的中间地位,他们很容易受支配阶级的影响,因而经常对民主政治采取不同的态度。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民主化的重要发起力量,他们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关键行动者;历史上普选权、结社权和其它许多民主政治权利都是由他们推动实现的。罗斯切梅尔等人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之所以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出现,就是因为它削弱了上层反民主的地主阶级的力量,加强了支持民主的工人阶级和其它附属阶级的力量,形成了有利于民主化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①罗斯切梅尔虽然和莫尔一样强调社会结构对民主化发生的重要性,不过与莫尔认为资产阶级导致了民主不同,他认为工人阶级才是民主的主要支持者。

3. 理论的进步与不足

与现代化理论相比,民主化的结构理论阐释了资本主义发展如何推动了民主政治,揭开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黑箱,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因果机制,在理论上显得更为丰满和完善。而且,结构理论用更多的社会、历史、经济变量来解释民主化的发生和发展,不仅探讨了民主化的动因和阻力,还描述了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过程。因此,它没有像现代化理论那样招致众多的批判。

尽管如此,其不足之处仍然十分明显。民主化结构理论的复杂解释与推理来自于个别案例分析,而且案例的选择具有随意性;其理论的普遍性、精确性和科学性因而经常为人诟病;其结论的有效性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检测和证明。譬如,非洲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没有形成明显的阶级分化,即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工人阶级,而且还存在着种族的分裂,但是民主政治依然在那里的一些国家获得了建立,结构理论的结论在那里显然并不适用。结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一样,也没有为政治领导、政治精

英的选择留有空间。正如普沃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在结构理论的论证中“民主政治的结果是由社会条件单方面决定的,即使人们什么都不做,历史还是会这样发展”^②。因此,民主化的结构理论如果想要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需要在应用中不断完善自身。

(三)文化理论

1. 理论的基本要义

民主化的文化理论认为,在民主政治的确立过程中,文化因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模式在它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和相关的行为模式方面对民主化的有利程度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些文化模式更利于民主化的发生,而另外一些文化模式则会阻碍民主化的发生。民主化的文化理论希望通过对不同文化观念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最有利于民主或民主化的文化模式;并解释各种文化模式如何作用于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为什么一些文化模式会阻碍民主化、而另外一些会促进民主化。

2. 理论的发展脉络

首先,民主化的文化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阿尔蒙德和维巴。他们在1962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对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的政治文化与民主关系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在卷入和冷漠、理性与情感、共识与分歧方面都维持平衡的公民文化模式最有利于建立和保持稳定的、有效率的民主政治体系;新兴国家的民主化不仅是建立正式的民主制度,关键还在于培育一种公民文化。^③其次,达尔也认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的信仰,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的信仰,会阻碍或促进民主化的发生,因此包含着对民主政治信仰的政治文化模式最有利于民主化的发生。^④第三,亨廷顿对民主化的历史考察发现,自十九世纪以来多数民主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1990年的58个民主国家中,37个是西欧和拉美国家,6个东欧国家,9个前英美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只有6个国家与西方文化渊源不深;而在第三波中实现民主化的30个国家中,26个要么是西方国家,要么是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他据此推断,以世俗理性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模式最适合或者是唯一适合民主政治的文化模式。^⑤第四,利普塞特在后来研究中发现宗教信仰、历史经验等文化因素对民主化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基督教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特别强调对个人的尊重及对反对者的宽容,因而最有利于催生民主化;而那些在历史上与基督教国家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则更容易发生民主化。^⑥第五,英格里哈特把文化分为传统文化、生存文化和自我表达的文化三种模式。他认为自我表达的文化强调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和自我表达,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对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和繁荣具有重要的作用;而那种相信民主可以在任何社会轻易建立、忽视潜在文化背景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的

①Dietrich Rueschmeyer,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olity Press, 1992, 270-281.

②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1.

③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M].华夏出版社,1989:517-553.

④罗伯特·达尔.多头政治:参与和反对[M].北京:商务印书,2003:140-145.

⑤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62-363.

⑥Lipset. 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No.4, Fall, 1990, P82.

文化模式从传统文化或生存文化向自我表达文化的过渡,会使该国家的民主化逐渐变得不可避免,并最终导致民主政治的实现;现代化通过改变文化模式作用于民主化,由于特殊传统文化模式的影响,现代化不能产生自我表达文化的国家,民主化难以发生。^①在英格里哈特看来,自我表达的文化不仅是最适合民主政治的文化模式,而且是民主化的动因和前提。

大部分学者认为,东方的各种文化模式不利于甚或阻碍了民主化的发生。施伯勒认为,亚洲各国的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集体主义观念,而个人主义观念太弱;缺乏维护个人权利的自由精神和政府对于反对意见的宽容精神,因此它不利于亚洲民主化的发生,并使得已经产生的民主政制十分脆弱。^②科顿在论述东亚民主政体时指出,儒家文化反对政治上的妥协,相信知识阶级领导国家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之事(不承认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对国家采取集体主义与有机论的概念(不利于政治竞争规则的建立),因此是妨碍民主反对运动发展的重要障碍;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虽然不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但是文化因素中的恩庇侍从关系和深厚的君主政体传统同样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③派伊虽然承认儒家文化传统不会阻碍现代化,但是他认为儒家观念确实更容易产生集权、等级制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民主的政治秩序。^④

3. 理论的进步与不足

民主化的文化理论的确发现了影响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变量,使得对民主化的理解更加全面和科学。文化的视角对于民主化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它没有理清特定的文化模式是如何产生民主的,也不能从经验上证明特定的文化模式与民主化的对应关系。在学者们认为政治文化不利于民主化发生的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民主化转型,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普沃斯基等对1950年至1990年间发生民主化转型国家的大规模统计分析表明,文化模式与民主化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⑤

民主化的文化理论把文化因素看作民主化的决定性变量,认为只有特定的文化模式才能产生民主政治的决定论论调,更是饱受诟病。文化因素尽管能够凝聚个人的行为,规制人们的预期,产生集体行动,维护既有的价值与制度;但是它很少作为独立的因变量起作用,总要通过公众和精英的政治行为(而它是文化影响、主观认知、利益计算的复杂结果)影响到政治制度。而且,文化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常被寻求公众支持的政治精英重新塑造。客观的看,文化因素只是影响民主化的变量之一;特定的文化模式或有助于或阻碍了,但绝不能决定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前景。

二、民主化的微观理论(过程理论)

1. 理论的基本要义

民主化的过程理论强调各类政治精英选择和行为的重要性。它认为从威权政体开始崩溃到新政体建立的这段时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此期间,既可能建立民主政体,也可能建立新的威权政体;政治精英的信念态度、利益计算、策略选择和行为互动对最终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使是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等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政治精英的努力也能推动民主化发生、发展,构建起民主体系。

2. 理论的发展脉络

首先,罗斯托是民主化过程理论的先驱。他认为现代化等民主化理论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因素最能够维持和提高一个民主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健康”,而他的主要问题是“民主政治体系在一个地方是怎么产生的”。他认为任何国家民主政治体系的建立都包括四个阶段:(1)民族国家的统一;(2)民主化的准备阶段;(3)民主化的决定阶段;(4)习惯阶段。^⑥罗斯托在解释民主政治产生的过程中,特别关注政治精英的作用;在他看来政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启动了民主化进程;没有政治精英有意识的妥协和选择,民主政治就不会在某个历史性时刻建立起来。

第二,继罗斯托之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政治精英及其互动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了丰富的“转型文献”。(1)林兹指出,尽管社会经济结构对于民主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依然为政治精英留下了充足的选择空间,政治精英的选择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个政体稳定或持久的可能性。在危机状况下,领导人、特别是具有独特能力和性格的个别领导人的存在,可以是决定性的,而且无法为任何模型所预测。^⑦(2)奥唐奈和施密特强调政体体系的转型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偶然性事件、不充足的信息、急切和鲁莽的选择、模糊的利益和动机、不确定的政治身份以及特别个体的政治才能在决定政体变迁结果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的信念、关系、策略和利益计算等因素。他们认为,任何民主转型都是威权政体内部政治精英之间分裂的结果;政治精英之间的协商可以减少转型过程中的冲突,增加相互竞争者之间妥协的意愿,最成功的民主转型就是通过政治精英之间的协商实现民主政治的建立。^⑧(3)

①Inglehart. Modernization, Culture Chang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9.

②Robert Scalapino,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 Century 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90.

③科顿:东亚民主政体的进步与局限,见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85-286.

④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5-60.

⑤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6.

⑥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in Geoffrey Pridham Edite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59-87.

⑦Juan J. Linz.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4-5.

⑧Guillermo O'Donnell, Phil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5-19.

普沃斯基也相信统治精英之间的分裂是民主化开始的关键因素,威权政体内部政治精英之间的分裂和公民社会的互动导致了自由化,而一旦自由化开始就会通过政治领导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走上民主化。他还借用奥唐奈和施密特的观点,把政治精英分为威权集团内部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阵营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四类;并认为只有温和派与改革派结盟才能实现有保证的民主,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会产生无保证的民主,改革派与强硬派结盟威权政体会做出让步后保存下来,而改革派和强硬派结盟威权政体就原封不动的存续下来。^①(4)帕尔马(Palma)也强调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他用“设计”一词来表示政治精英的努力在推动民主中的作用。在所有政治精英采取的战略中,他特别强调容纳所有竞争性集团的包容性战略。通过包容性战略,所有重要集团的利益在民主化过程中都能得到考虑,竞争性的集团就不会诉诸极端的暴力手段追求各自的目标,他们也就遵循政治领导做出的决策和新的民主制度和规则。^②

3. 理论的进步与不足

民主化的过程理论用政治精英及其之间的关系互动来解释民主化,认为威权政体内精英之间的分裂是民主化的动力,政治精英的信念、计算、部署和行动塑造了民主化的过程和结果。它的优点在于强调了被现代化理论、结构理论和文化理论长期忽视了的政治行动者的作用,较为细致的描述了民主化的整个过程和阶段,为人的能动性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但是,过程理论集中于对从威权政体崩溃到民主政体的建立这段较短时期的研究,强调转型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把政治精英的个体行动看作是不确定性环境下民主转型的垄断力量,一切都是主观力量和偶然性事件的具体结果,也使得对民主化的理论解释变得乏力。过程理论的另一缺陷在于它忽视了社会公众和非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很少有过程理论提到社会公众,更不要说把他们看作解释民主化的主要力量。而事实上“大众力量能够超越精英主义的运动带来民主化,无论是在民族国家的层面还是在他们相对自主的地区或社区”。^③其他领域内精英和社会公众的态度、行为同样是理解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变量,但也经常被民主化的过程理论所忽视。

三、民主化的理论融合

1. 民主化宏微观理论的缺陷

民主化的现代化理论、结构理论和文化理论因为聚焦于宏大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客观条件对民主化的影响,也被称为宏观导向的理论或统称为结构理论;过程理论强调个别政治精英的利益计算、主观认知和行为选择在民主化中

的作用,因此称为微观导向的过程理论。

宏观导向的结构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于,过于强调客观结构条件的决定作用,没有为主观意志和行为选择留下空间;它们或许能够解释民主化发生的动力,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民主化在这个时间发生而不是另外的时间,更无法阐明民主转型的过程;宏观的结构理论要提供满意的理论解释,就必须认真对待政治行动者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微观过程理论太过专注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忽视了政治行为赖以发生的结构条件。事实上,政治行动者并不是在真空中发挥他们的作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他们的政治行为。所以,微观的过程理论也必须把政治行动者的主观意志和战略选择与结构条件联系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决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2. 理论融合的尝试

第一,路径依赖理论的提出。林兹和斯蒂潘把非民主体制分成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苏丹政体四种类型,把政治行为者的活动范围划分为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制度化的经济社会、官僚机构、法律规范五个部分,然后分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特征对民主转型模式的影响、政治行为者在不同领域内的互动对民主巩固的影响,指出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受到政体类型和活动领域的限制,导致了差异的民主化转型路径和民主巩固状况。^⑤林兹和斯蒂潘强调政治精英的选择不是发生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偶然环境中,而是依赖于以往政治社会结构提供的机会和限制,过去的历史影响到现在的选择,希望以此实现宏观结构因素和微观选择因素的融合。有学者把这种方法称为“路径依赖”,并指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本质是现在的选择由之前的选择构成,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并巧妙的塑造着政治精英的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路径依赖理论既认同政治精英的行动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也认同政治精英必须在特定的结构条件下行动。^⑥林兹和斯蒂潘的路径依赖理论相对于宏观的结构理论和微观的过程理论的确是个进步,但它并不能解释宏观结构怎么影响战略选择,也不能解释政治行动者如何应对宏观结构的限制。而且它主要关注以往的政治体制对现在政治选择的影响,只考虑政治结构对民主转型过程的限制,没有把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因素放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深入分析这些因素与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路径依赖理论仍然没能实现宏观结构因素与微观过程变量的有机融合。

第二,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克服结构的决定作用与个体的能动作用之间的对立,提供一个兼顾

①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0.

②Giuseppe Di Palma. To Craft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9.

③Lars Rudebeck Edite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hird World,Macmillan Press,1998,P10.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⑤Juan J.Linz,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7-15.

⑥Graeme Gill. 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Macmillan Press,2000,P89-90.

结构和能动的解释框架。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既包括规范性要素和表义性符码,又包括对物体、商品或物质现象产生控制能力的配置性资源和对人或行动产生控制能力的权威性资源。结构因此呈现出管制性与构成性相结合、限制性与使动性相结合的二重性特征。而个体行动者具有人类特有的理性和反思性特征,他们监控着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并依据对结构的规则和资源的认知采取行动。吉登斯接着指出,行动者在行动时,通过理性和反思利用了丰富多样的行动情景下的规则与资源;结构也不是外在于个人的某种东西或固定框架,而是作为记忆痕迹和实际经验内在于个人的实际行动当中;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即是结构对行为的限制和使动,也是能动作用再生产结构和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①吉登斯通过引入结构二重性和结构化概念,把结构看作是蕴含于能动行为之中的规则与资源,把能动行为看作是结构性特征的体现和结构的再生产,从而实现了两者的有机融合、勾销了两者的对立。尽管吉登斯抹平结构与能动作用之间差异的作法招致了诸多的批评,但是他对结构和行动者的诠释以及连接两者的方式,对于融合民主化研究的宏观理论法和微观理论仍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畴和思路。

3、理论的进步与不足

与路径依赖理论相比,民主化的结构化理论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的宏观结构因素都纳入了分析框架,并且通过强调结构的二重性特征、政治行动者的理性和反思性对于结构因素的内化、策略选择的地位,解释了结构和政治行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实现了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的有机融合。

吉登斯在解释结构和制度变迁的时候总是强调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他更愿意把变迁看作是跨社会系统之间相互学习的结果,而很少关注作为变迁主要动力的行为者之间的冲突。因此,民主化的结构化理论不能替代过程理论对和其它理论对民主化动因和过程的研究,它只是在把不同的因素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显得更为有用。

(四)简单的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民主化的理论系谱,使我们温故知新。这些理论在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进化色彩,后一种理论的发展是针对前一种理论存在的缺陷而进行的。总的说来,从宏观理论、微观理论到理论融合不仅代表着民主化理论的研究成就和发展趋势,而且对于那些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Cutright.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measure and analysis [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J], 28(April).
- [3]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in Geoffrey Pridham Edite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M].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Dietrich Rueschmeyer,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M]. Polity Press, 1992.

[5]Giuseppe Di Palma. To Craft Democracy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6]Graeme Gill. 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 [M]. Macmillan Press, 2000.

[7]Guillermo O'Donnell, Phil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8]Inglehart. Modernization, Culture Change, and Democrac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9]Juan J. Linz.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 [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10]Juan J. Linz,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Lars Rudebeck Edite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M]. Macmillan Press, 1998.

[13]Lipset. 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J]. No. 4, Fall, 1990.

[14]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 1985.

[15]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9.

[16]Robert J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M]. MIT Press, 1985.

[17]Robert Scalapino.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 Century Asia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巴林顿·莫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19]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20]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21]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22]罗伯特·达尔.多头政治:参与和反对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3]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4]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25]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王建华

^①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61-93.